

冯塔纳“柏林小说姊妹篇”中的城市空间书写

傅 琪

(大连外国语学院 德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44)

摘要: 德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台奥多·冯塔纳的“柏林小说姊妹篇”是德语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柏林城市书写文本。作品巧妙地赋予德意志历史以空间维度, 城市书写中隐含了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变化中各种因素和力量的建构与解构过程动态揭示了城市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的三位一体本质和互动发展模式, 也由此折射出德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划时代变迁。

关键词: 台奥多·冯塔纳; 柏林; 过渡态; 空间话语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4)02-0129-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10926339

On the Urban Space Writing in Fontane's Berlin Novels

FU Qi

(School of German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 Theodor Fontane's Berlin Novels are representative urban novels in German literature. His works craftily endow German history with a spatial dimension, and their urban writing impli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production mode, social relations and class relations.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various factors and forces in the changes dynamically reveals the trinity nature and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urban materiality, spirituality and sociality, which reflects the epoch-making changes of Germany's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Keywords: Theodor Fontane; Berlin; transition modal; spatial discourse

台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 1819—1898)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扛鼎巨匠,也是德意志“19世纪的见证人”^[1]。这位极具国际视野的作家开创了德语文学中的“柏林小说”系列,并以独特的城市体验和文学表达为威廉时代的柏林定义了真实而准确的时空坐标,进而透过柏林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聚集态”^[2]映射出整个德国19世纪下半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谷裕在其专著中写道:“在19世纪德语小说创作中,

冯塔纳的作品是唯一一次逾越了德语文学特有的成长发展小说和乡土小说传统而进行的现实主义写作尝试。德语文学也因此拥有了可与欧洲文学同时代现实主义作品相媲美的小作品。”^[3]毫不夸张地说,冯塔纳笔下的柏林与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一道,将19世纪的欧洲连成了现实主义视阈下的空间统一体,立体式展现了当时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因此,无论从柏林城市文本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收稿日期: 2021-09-26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现当代德语文学中的柏林书写研究”(L21BWW006)

作者简介: 傅 琪,女,副教授。研究方向: 现当代德语文学。E-mail: fuqi5277@163.com

而言,还是从冯塔纳在德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言,都有必要对冯塔纳经典作品中的柏林进行深入剖析和解读。本文即以冯塔纳的“柏林小说姊妹篇”《混乱与迷惘》(*Irrungen, Wirrungen*, 1888年)和《施蒂娜》(*Stine*, 1890年)为分析文本,揭示作品中蕴含的城市意象与空间话语,解析威廉时代的“过渡态”柏林。

从历史意义出发,对空间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分段,是市民现实主义的叙事要求。“冯塔纳的精神图集几乎无一例外地彰显一种历史化的时间维度,以至于读者仿佛面对由时空叠合而成的测绘图。”^[4]他主要通过重大历史数据、人名、地名以及由历史主导的图貌,描绘时空叠合,空间话语由此悄然展开。

一、《混乱与迷惘》中城市化与“被城市化”的空间

前工业社会以传统主义为轴心,旨在同自然界竞争,以土地为主要资源,封建地主或军人贵族拥有空间统治权。城市是地理单元,是人造的第二自然。1871年德国统一后,柏林的城市化进程加快,随之而来的还有乡村的“被城市化”。两种进程相辅相成,试图为柏林迎接工业时代开辟更大的自然空间。难以马上被容纳的劳动力迅速涌入,而城市的精神风貌陈旧落后,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前工业时代正在极速扩展的柏林陷入了不可避免的混乱与无序状态。

《混乱与迷惘》开篇第一句便是时间和空间定位:“70年代中期,在选帝侯大道和选帝侯大街的交汇点上,在动物园的斜对面,还有一个延伸到田野里的大园圃。”^[5]作者在小说伊始就设定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场域。选帝侯大道(Kurfürstendamm)长约3.5公里,位于夏洛滕堡宫和威尔默斯多夫(Wilmersdorf)^①之间,是柏林西部一条著名的林荫大道,其东北面便是东西走向的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straße)。虽有一字之差,但都得名于昔日的勃兰登堡选帝侯。动物园(Zoologischer Garten)位于柏林西部,原为皇家狩猎场,经改造后,1844年首次向社会开放,成为当时颇受人们喜欢的郊游场所。在笔者看来,冯塔纳在小说开篇介绍的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理范畴,他还用这几个标志性的地理定位,反映了当时的主导城市形

态和社会构成。选帝侯大道和大街交汇,搭建出当时的统治秩序,而在这个统治秩序中,封建贵族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动物园的修建亦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送给柏林的礼物。城市空间此前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意志规划的产物,体现着封建社会的道德秩序。在这个封建贵族主宰的城市里,冯塔纳却用一个“延伸到田野里的大园圃”^[5]给人带来了一丝清新的希望,因为那里蓄积着这个社会的新生力量。“这个园圃的其余部分,其实应该说,是这座园圃中最重要的部分,却被这所小房子像幕布一样遮住了。只有挂在被刷成红绿相间颜色的小木塔尖顶上的掉了一半的表盘(谈不上是一个钟)。”^[5]冯塔纳甚至将这个静谧的空间置于“时间”之外,它若有若无,忽隐忽现,似乎与城市的繁华和喧闹相隔绝,女主人公蕾娜和她的养母便住在这片貌似“遁藏于世外”的狄尔庄园(Die Dörrische Gärtnerei)中。

小说主人公蕾娜是一个烫衣女,在一次郊游中划船遇险,幸得贵族军官博托相救才化险为夷,二人因此相识于施特拉劳(Stralau)。这是柏林城区弗里德里希海因-克劳伊茨贝格(Friedrichshain-Kreuzberg)的一个地方,位于施普雷河(Die Spree)与鲁默尔斯堡湖(Rummelsburger See)之间的一个岬角上,也就是一个半岛上。冯塔纳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起点安排在岛屿上,暗示了这场等级门第差距悬殊的恋爱只能发生在“与世隔绝”的非城市化孤岛上。二人后来的恋爱经历也证明,他们只有在远离喧嚣的乡间漫步和郊游远足中才能拥有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但凡有一丝社会尘俗打入,一切就会被扰乱,恋爱空间就不再专属于他们,从而失去了超脱社会律法的特权”^[6]。这种富有深意的空间设定反映了当时普鲁士社会的等级观念,贵族与平民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无果而终的游戏。

博托与蕾娜恋爱后,人烟稀少的乡村小路往往是他们培育爱情的宁谧空间。然而,并不是所有乡间小径都漂亮、安静。“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里展现出了独特的城郊生活”^[5],由城里通往威尔默斯多夫的路有四五条,它们发挥着补充城市空间的功能。路上有各种各样的简易工棚,还有被褥和地毯挂在支架上,人们用大木棍在上面敲打,使得整条路尘土飞扬。这一方面表现了城市内部空间的饱和

① 威尔默斯多夫,柏林第九行政区的名字,在当时还是一个村子。

与狭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生活方式向乡村空间的推挤和渗透。对乡村而言，这是一个“被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虽然乡村的人们没有进入城市，但城市却在不断向乡村扩展，并且影响和改变着那里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从而使乡村被裹挟到城市化进程中。再者，借助铁路和蒸汽机船等交通工具，社会上层的有钱人可以随意实现远距离的郊游。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跨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森林和原野等广袤阻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使得乡间田园也转变为城市的补充空间。

让我们将视野转回城市。在第六章开头，冯塔纳写道：

这是一个星期之后，栗树花已经凋谢，贝勒维大街上的也是这样。男爵博托·冯·里奈克在这儿有一套位于公寓底层的住房，具体位于前面阳台和园子阳台之间：工作室、餐厅、卧室。所有这些房间都布置得很有品味，明显超出他的收入水平^{[5]38}。

贝勒维大街（Bellevuestraße）是柏林西部的贵族居住区，位于波茨坦广场和动物园南部边缘之间。作者用这样的居住空间影射当时悬殊的阶级差别。虽然主人公住所的空间陈设与男爵的贵族身份相匹配，但是其逐渐衰落的生命力和几乎为零的生产力却暴露一个趋势：他所代表的贵族阶层正在走向没落。博托的舅舅每到柏林都会住在豪华的勃兰登堡酒店，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柏林是个污浊的鸟巢”^{[5]39}。这源于贵族阶层特有的优越感与傲慢。他们用居高临下的姿态俯瞰这座城市的众生万象，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们自身正渐渐失去支撑的高度，终将一落千丈。这里的“鸟巢”并不是随口的比喻，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紧密相连的。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加之工业革命的影响，首都柏林一度成为人口迁入的主要目的地。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有限的城市空间一时难以容纳过多劳动人口，他们大多住在“军营式的出租楼房”（Mietskaserne）里，条件极为简陋。因为人口激增，城市也不再是贵族养尊处优的专属领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再造开始打破原来固化的阶级秩序和等级秩序。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启，德国经济迅速增长，柏林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也步入实质性阶段。于是，鸟巢式稠密的外来人口居住地就成为柏林的重要特征。冯塔纳借男主人公博托之口，夸耀柏林因城市化带来的进步与繁华而成为“最好的世界之一”^{[5]42}。

小说第七章中这几行文字向读者展现了柏林作

为普鲁士都城的主要地标：

……博托·冯·里奈克沿着菩提树下大街，朝勃兰登堡门走去……然后他穿过巴黎广场，朝勃兰登堡门方向走去，拐进左前方的蒂尔加滕林荫大道，一直走到沃尔夫的狮子雕塑前才停下。……于是，他又转身，准备原路返回菩提树下大街。在雷代恩宫殿前，他看见了轻骑兵卫队的维德尔上尉迎面走来^{[5]42-43}。

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er Tor）和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是封建制度下普鲁士的空间代言。这里完全是上层社会的活动场域，里面充斥着各色达官贵人，唯独缺少给人生命活力的“清新的空气”，正如博托的舅舅所嘲讽的那般：“你们美丽的柏林越来越漂亮。你们柏林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清新的空气。”^{[5]45}工业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使城市作为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都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序和混乱状态，这是前工业时代的普遍景象，直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进入明晰而有序的城市化轨道。作家此时已不再有意渲染“乡村乌托邦”和“城市梦魇”的对立，因为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这种对立已经渐渐退位于日益显著的阶级矛盾。

男主人公博托最终没有与自己的心上人蕾娜成婚，反而为了挽救家族经济危机娶了门当户对的贵族千金小姐——他的表妹凯特为妻。他在愤懑中策马，以宣泄永失真爱的苦闷。“他走上一条宽阔的大路；这条路穿越沼泽、田野、通往永弗尔草原。”^{[5]105}封建的等级和道德观念依旧牢牢地禁锢并统治着城市的精神秩序，博托试图摆脱，然而在一番辗转和纠结后，还是不得不“调转马头；横穿田野，朝一个大工厂走去。那是一个冷轧厂或者是机器制造厂”^{[5]108}。工业发展不可阻挡的气息已经扩散到城市空间的每个角落，这是新兴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在城市空间里，先进的物质性经验与陈旧的精神秩序越来越不协调，这也是早期城市化的突出表现之一。不过，城市的社会性终将使二者握手言和。

二、《施蒂娜》中新旧交替的城市样板

城市绝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物理性存在，它更是一种“概念化的空间”，蕴含着道德秩序、仪式行为、习俗传统等因素，并与生产关系以及由生产关系设定的秩序紧密关联。城市空间的扩大与增容，

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势必要求新的精神品性与之相匹配,这是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施蒂娜》中的柏林就是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城市样板。

小说中的空间设定以施普雷河(Die Spree)为界,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施普雷河北岸的伤残者大街(Invalidenstraße)周边,属于“第四等级”社会阶层的女主人公施蒂娜及其表姐宝丽娜便租住在这一区域;另一个是施普雷河南岸的弗里德里希城(Friedrichstadt),地处柏林老城西部,故事中的贵族阶层老伯爵萨拉斯特罗和男爵帕帕盖诺的宅邸都位于该区域。单单从这一分区来看,便可发现明显的差异和对立。

小说开篇首句依旧是具体的空间定位——“伤残者大街”,它得名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1748年下令建造的“伤残者收容院”^{[7]149},是柏林西北部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收容院位于沙恩霍斯特街(Scharnhorststraße),北端与伤残者大街相连。紧挨着收容院的是教堂墓地,其中安葬着很多普鲁士军队的高级将领,如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将军,博伊恩(Boyen)元帅等。在故事发生的时期,这片街区还有很多军营和练兵场。冯塔纳也由此凸显了柏林当时依旧浓郁的军事特色。赵蕾莲认为,冯塔纳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它象征“连接各种对立”^[8],这不无道理。当然,冯塔纳更直接的目的在于,借此隐喻男主人公瓦尔德玛尔在战争中身负重伤的经历和命运。

伤残者大街位于柏林的奥拉宁堡郊区(Oranienburger Vorstadt)。这个城区属于柏林近郊,融合了民居、工业生产、零售业和密集交通等诸多大城市功能。冯塔纳在《勃兰登堡漫游记》中指出,它是柏林城中“人口最多,可能也是最有意思的近郊区”^{[9]156}。因此,伤残者大街全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有“残缺”,而是“热闹”非凡:

它面积广大,有火车站、军营、墓地、钢铁厂等工业企业,整个区域呈现明显的非均质性特征。吹吹打打的庞大送葬队伍和部队操练经常交替出现或正面遭遇,大量民众拥挤围观,交通阻塞,这些都是此处的常态化街景。火车头的鸣笛声刺耳,炼钢厂的烟囱上飘动着著名的黑色旗帜^{[9]156}。

在冯塔纳笔下,这是一片“充足、富裕和具有实干精神”^{[9]156}的区域。他还认为,当时的“奥拉宁堡区就像一个新时代和新精神孕育的孩子”^{[9]157}。

“新精神的一个标志便是伤残者大街上1865年修设有轨马车。”^[10]冯塔纳在文中也描写了这条街

道日常的热闹景象:“有轨马车发出铃铛响,机械工人去吃午饭”^{[7]5},“一辆安装着一个破旧的蒸汽锅炉的载重汽车正轰鸣着、颤抖着开过来”^{[7]7},“波尔基希和施瓦尔茨考本的机械工人们恰好沿路走过来”^{[7]5}。波尔基希(Borsig)机械厂1837年以来在奥拉宁堡城门前生产,施瓦尔茨考本(Schwarzkoppen)工厂区毗邻伤残者大街。德国工业革命较欧洲其他国家起步晚,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才大为发展。重视重工业是德国工业革命的突出特点。德国统一前的煤炭和钢铁产量都已超过法国,只有蒸汽机的使用还落在后面。

小说女主人公就住在这条街上狭仄的出租房里。身为“第四等级”出身的绣工,施蒂娜见证着柏林这座城市的繁荣与成长,但她始终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城市空间。如果说《混乱与迷惘》中的女主人公蕾娜代表社会底层的无产者,还与城市空间保持着明显界限,那么,施蒂娜及其表姐宝丽娜所代表的“第四等级”已然融入到城市空间里。没落贵族、教士、市民以及底层无产阶级汇集到有限的城市空间里,共同塑造城市的精神品性。从市容和街景来看,市民阶层无疑是新的城市空间的塑造者,工业革命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加快空间生产的进程。城市空间的社会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发明显,此时的柏林正生机勃勃地向四周延伸和拓展。

诚如伊拉·卡茨奈尔逊(Ira Katznelson)所言,人活动于其中的空间范畴往往代表人的社会地位:空间不再是“一个类似本体论的范畴,而是一个既形塑(人们)又被人们形塑的社会维度”^[11]。在小说《施蒂娜》中,男主人公瓦尔德玛尔及其叔叔老伯爵还有帕帕盖诺男爵这三个人物表达了对自己居住地的喜好,这种评价更加彰显了空间与社会互相塑造的动态过程。

帕帕盖诺男爵“在选择城市街区时,……选择了齐顿广场(Zietenplatz)和莫伦大街(Mohrenstraße)的街角。……他把其要塞一角视为这座城市最美的点”^{[7]59}。而老伯爵“更偏爱贝伦大街(Behrenstraße),他在每次为此而发生的争执中都处于劣势,因为他处于糟糕的处境中,不得不用对君主秩序、对统治者家族的依恋情感,来反驳事实”^{[7]59}。

帕帕盖诺男爵对自己住所优越的地理位置津津乐道,这个完美的空间甚至能激发他强烈的爱国热情:

伯爵,……您在贝伦大街有什么?您七年来一直看着大街上的大门,您只看到一辆马车拉着一个老公主或者一个更老的宫廷贵妇。……现在您却要

拿这个和我的莫伦大街街角相比。从我这里向外眺望，只要天公作美，整个柏林都在我的脚下，……我每天早晨首先能问候的是塑像基座上的老齐顿。……在我的将军们的雕像后面，政府办公大楼高高耸立，普莱斯和波尔基希。如果我再俯身，我甚至会看到拉德茨维尔，现在的俾斯麦的栅栏，我就会浑身渗透着爱国主义的高涨热情：这里是老弗里德里希统治下的普鲁士；那儿是铁血宰相统治下的普鲁士^{[7]59-60}。

小说第十五章描写了男主人公瓦尔德玛尔回家的路线和其住所情况，细节处尽显柏林的城市新发展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军事特色：

瓦尔德玛尔向右朝奥拉宁堡大门走去，因为他打算在一家位于菩提树下大街与弗里德里希大街拐角处的银行了结许多银行业务。……所以，他放弃进城的路，返回他的住处，它就在参谋部大楼的后面。他通过这套住房而成为毛奇的邻居，他很乐于强调与毛奇的邻里关系^{[7]97}。

值得注意的还有男主人公住处所在的地理位置，一面朝向老城，一面朝向正在开发建设的“新城”：

这套房子就在齐顿大街的开头，由位于两个台阶上面的前屋和后屋组成。其中一个房间朝向克罗尔公园的树木；另一个朝向一个被草覆盖的、直抵施普雷河的建筑工地。在工地的后面是莫亚比特区的红色屋顶，再向后靠左侧是永弗尔草原的绿色边缘^{[7]100}。

不难看出，作者对小说人物住所的设定不仅与人物的身份和社会等级紧密相连，而且在一种具有话语性的建构下，充分彰显了城市空间的社会性特征。帕帕盖诺男爵住在威廉广场的富人区，即今天的恩斯特·台尔曼广场（Ernst-Thälmann-Platz）。广场上的雕像是轻骑兵将军汉斯·尤阿希姆·冯·齐顿（Hans Jochim von Zieten, 1699—1786），本由大理石制成，1862年被一个青铜的复制品取代。城市是意识形态的雕塑品，这是城市精神性的表现之一。将军们的雕像往往矗立在重要广场的中心位置，这无疑是一种尚武精神的体现，同时也说明，“尚武”依旧是德意志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普鲁士文化传统的核心。男主人公瓦尔德玛尔曾在普鲁士军队服役，他深感与“战功卓著”的英雄毛奇为邻无上荣耀，这亦是证明。

冯塔纳一向抨击普鲁士的黠武主义，因为这种国策使普鲁士民不聊生，却赋予贵族军官阶层独有的特权，因为他们完全脱离宪法，而只需效忠皇帝。

普鲁士军队在新帝国中成为权力和影响力的象征。高耸的政府办公大楼和设在拉德茨维尔王侯官邸的总理府皆为当时政治稳固的表征。俾斯麦的统治固若金汤，他通过铁腕政策统一德国，实行重商主义。50亿金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使国家瞬间变富，使长期饱受分崩离析之苦的德国人一时间“爱国主义”热情高涨。

工商业的飞跃式发展极大促进了各个领域的繁荣进步。位于城市中心繁华地区的银行便是金融业发展的标志。德国银行是刺激经济进步并促进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德国银行同英国和美国的早期银行不同，其最大特点是生产信贷业务超过货币信贷业务，信贷银行与工业生产积极结合，促成了德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威廉大街上的西里西亚大地产商以及工业巨头普莱斯（Pleß）官邸和火车机车国王阿尔贝尔特·波尔基希（Albert Borsig）官邸被视作令人骄傲的街景，这足以证明发展工商业在人们观念中的接受和肯定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尽管如此，以老伯爵为代表的没落贵族依旧是社会的主导，他们对君主秩序和统治者家族依然充满敬畏和“依恋情感”^{[7]59}。尽管资本主义的空间再造极大地改变了柏林的城市布局，但城市的精神性依旧为封建阶级控制，当时的社会本质依然是“普鲁士的”，因为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并不是资产阶级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结果，而更多归功于封建统治阶级铁血强权的“顶层设计”^[12]。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德国封建贵族对德国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伤残者大街上的“第四等级”阶层尽管已融入城市空间，与其他阶层一起参与着人与城市的互动，可他们依旧毫无话语权。当老伯爵想见宝丽娜时，只需递个信儿，便可带着他的“上层社会”朋友驾临情人的“寒舍”，并受到贵宾一样的款待，奥拉宁堡城郊不过是贵族阶层休闲消遣的去处罢了。

柏林的空间深深打上了阶级烙印，施普雷河成为现代化城市近郊与老柏林中心区的自然分界线，男主人公瓦尔德玛尔的住处恰恰就位于这新与旧的交界。小说中所有人物住所的地点和空间设定皆出于作者的匠心安排，目的就是凸显当时柏林乃至整个德国的“过渡态”特征。马克思更是上升到国家高度，对这种新旧交替做出了精辟的总结：那时的普鲁士就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13]。

三、结语

纵观冯塔纳的柏林系列小说,其空间描写平实、真切、深邃,蕴含丰富而深刻的延展意象和内在话语。《混乱与迷惘》主要展现了前工业时代末期资本主义影响下的城市空间拓展,但新的物质性还不足以统摄陈旧的精神性,彼此的不协调导致了城市化进程中暂时的混乱与无序状态。《施蒂娜》中的柏林是处在新旧交替时期的城市样板。工业发展驱使下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在新生社会力量的参与下,城市形象得到重塑。城市的物质性与精神性不断较量、磨合,使城市发展趋于表面的秩序化和平稳化。然而,旧秩序却始终没有退出对城市的主导作用,新旧精神势均力敌,使柏林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过渡模式之中。

冯塔纳在细腻展现柏林城市风貌的同时,巧妙地赋予德意志历史以空间维度,记录了威廉时代一个过渡态的柏林:陈旧的柏林图景慢慢解体,崭新的柏林画卷逐渐展开。变化中各种因素和力量的建构与解构过程动态揭示了城市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的三位一体本质和互动发展模式,也由此折射出德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划时代变迁。

参考文献:

- [1] 吴晓樵. 隐藏与袒露——论特奥多尔·冯塔纳的小说《马蒂尔德·墨琳》[J]. 外国文学评论, 2018(4): 186-202.
- [2] FRIEDRICH T. Menschen des Übergangs, unfertige Stadt 1833—1898: Berlin als „Fontanopolis“ [C]//Fontane und sein Jahrhundert. Berlin: Henschel Verlag, 1998: 178-198.
- [3] 谷裕. 现代市民史诗——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研究[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4] PARR R. Kleine und große Weltentwürfe: Theodor Fontanes mentale Karten [C]//WOLZOGEN H D, FABER R, PEITSCH H. Theodor Fontane: Berlin, Brandenburg, Preußen, Deutschland, Europa und die Welt. Würzburg: Verla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GmbH, 2014: 17-40.
- [5] FONTANE T. Irrungen, Wirrungen [M]. Berlin: Aufbau Verlag, 2011.
- [6] OSTERHUS A, BORDERDING W, NUTZ M. Stundenblätter: Irrungen, Wirrungen [M]. Leipzig: Ernst Klett Schulbuchverlag, 2008.
- [7] FONTANE T. Stine [M]. Berlin: Aufbau Verlag, 2000.
- [8] 台奥多·冯塔纳. 施蒂娜 [M]. 赵蕾莲, 译.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3.
- [9] FONTANE T. Wanderungen durch die Mark Brandenburg [M]. München: Hanser Verlag, 1967.
- [10] DAFFA A. Frauenbilder in den Romanen *Stine* und *Mathilde Möhring* [M].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8.
- [11] KATZNELSON I.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M]. Oxford: Blackwell, 1988.
- [12] 傅琪. 《燕妮·特赖贝尔夫人》中的“对立性”寓所空间书写 [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 106-112.
- [13]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责编: 程爱婕)